

第十二講

抗戰後期國統區文學對社會黑暗的全面暴露

總論

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政府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在新聞和文方面也取了一個又一個的限制言論和思想政策，不但書刊店被查封，一大批文化界進步人士受到迫害，聞一多等人甚至遭到暗殺，這給國統區文藝進步運動帶來極大困難，先在成都、昆明、重慶、桂林，後發展到全國的廣泛的學生示威（ ��รษท้วง ）等發主運動，發出了“要民主、要自由、反饑餓、返迫害、反內戰”的呼聲，文藝工作者又走到了這場運動的前面，使們的作品在表達方式上也發生了變化。在缺少創作自由的氣氛下，他們的作品不像戰爭初期那樣直接、熱烈、明了。再加上抗戰也進入持久階段，戰爭局面穩定下來，人們的頭腦也冷靜了下來，對戰爭現實看得更清楚了，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方式更加不滿。因此，文學創作對國統區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批判加強了。這時的作品，不再表面地描寫抗戰，而是對抗戰背景下，對現實生活和社會關係，進行深入地思考。特別是小說作家們，可以更充分、全面地寫作，表現生活，出現了一個中長篇小說創作的熱潮，多種題材和思想傾向的作品大批出現。以反映抗戰、暴露黑暗為主。以茅盾的《腐蝕》、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蕭紅的《呼蘭河傳》等長篇小說為代表，加上新出現的新作，形成了抗戰中後期國統區小說創作的繁榮。如果我們再把四十年代後期國統區小說，和整個四十年代解放區小說放在一起來看，那就共同展現了一個比三十年代更加繁榮的小說世界。

在抗戰期間，尤其是一九四一年以後，中國現代話劇出現比三十代話劇成熟期更加發達的形勢。解放區的探索民族化表現工農兵，取得了成就。祇是國統區的發展，也超過了三十年代。而且，在歷史劇和諷刺劇的創作上，產生了“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品。從歷史劇來看，由於文化方面，國民政府的控制，迫使劇作家不能直接地反映社會問題，只能通過古人古事，來表現抗戰和人民的要求。在歷史上，這也是中國劇作家常用的方法。而一般的民眾，也都養成了用歷史看現實的習慣，能很容易地理解作者的意思。另外，由於抵抗外國侵略，作家和劇作家的民族意識都更強，這也容易使人回顧自己本族的歷史，從中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增強民族信心。這一時期，歷史劇最活躍和流行的地區，就是上海的“孤島”和國統區戰時首都重慶。因為在抗戰前方，已沒有了自由宣傳抗戰和革命的環境，戲劇人才就都向後方大城市和解放區轉移，另外，因為日本的封鎖（ ປົດກັນ ），外國電影和拍電影用的膠片，都很難進入中國，使影劇院沒有了上演的新片子，人們對戲/劇的興趣就大起來了。

也由於同樣的原因，文學設有創作自由，使作家選擇曲折的辦法，這時的諷刺和抒情文學，主要是指諷刺劇和諷刺詩，獲得了一個大發展。還有一個更主要的社會原因是，這時已到了國民黨統治的後期，腐敗、物價高漲等各種社會矛盾大暴露，到了可笑的地步。在黑暗與光明相接連的時候，也是適合于作家抒情的時代。這就是“七月”、“九葉”抒情詩派，袁水拍等諷刺產生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

茅盾《腐蝕》中的戰時首都重慶和老舍《四世同堂》中敵人占領下的北平。

一、茅盾的《腐蝕》

抗戰初期，國共兩黨誠心合作，共同打擊侵略者，全國上下都充滿了熱情和希望。後來，國民黨政府中，以蔣介石為首的一部分人，感到在戰爭中，共產黨的力量越打越強大，就開始害怕，於是就“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製造了想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的“皖南事變”，最先反映這個事件的，是茅盾的長篇小說《腐蝕》。在“皖南事變”發生的三個月，一九四一年夏，茅盾就在香港完成了這部小說。

這是一部日記體的心理小說，也是一部政治色彩很濃的作品。故事寫的背景，是一九八〇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二月這一段時間的重慶。從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日軍集中兵力進攻解放區，逃到四川的蔣介石政府，在戰時的國家首都重慶的反共活動，同時，通過兩派特務（**นักสืบ**）組織的內部關係，也可以了解那時抗戰首都黑暗可怕的一面。這兩個系統的特務是，一派由 R. 陳胖子、G. 小蓉、老表(biào)、F. 趙惠明和 N 等人組成的蔣記特務組織，另一派是由希強、松生、舜(shùn)英夫婦和 D 組成的汪精衛偽政府的特務組織。這兩派特務互相有聯繫，服務的主子不同，但目的一樣，汪記的特務從敵人占領的上海來到重慶，與蔣介石政府的上層重主官員接觸，他們都為了消滅共產黨，這些人計劃的結果，就是“皖南事變”和“蘇北事件”。

《腐蝕》的主題，是通過蔣記女特務趙惠明，在她日記中所寫的她自己的經歷展現出來的。趙惠明是“五四”運動接受了新思想的女知識青年，中學時代，她曾追求過光明。她因為反抗封建家庭而出走，當過學生運動的代表，後來，又參加抗戰工作，但由于她愛虛榮(มีความทะเยอทะยา),追求物質享受的個性，在黑暗的環境中，被一點一點“腐蝕”，以致當上了小特務，過着天天害人的鬼一樣的生活，她一方面，每天不停地到處偵察，跟蹤(ส่องรอย),檢查信件，然後收集情報，向上級匯報，得到“表揚”；另一方面，還得和其他特務鬼混(คลุกคลี),忍受大特務的侮辱和壓迫。作者在寫她被環境腐蝕壞的同時，也寫她並沒有像其他特務那樣，完全不要良心(จิตสำนึกร). 她有時也對自己的行為悔(kui)恨，作品寫了她受革命者小昭的影響，產生了真正的愛情，她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形象，後來在革命者影響下，有些轉變，也會保護幫助過他們，但當她自己感到危險時，她就又為自己想了，最後終於沒有逃出特務生活。

小說也通過趙惠明的所見所聞，寫出了重慶兩派特務之間的內部矛盾和他們的罪惡活動，特務們打進機關、學校、跟蹤、暗訪、殺害進步人士。N 的一個班三十多個同學，經過捕殺，一下子只剩下了十多個了。這些特務們的活動，把一個抗戰首都，變成了一個血淋淋(lín)的恐怖世界。

在完成這部長篇小說之後，茅盾來到廣西桂林，開始了一部長篇《霜葉紅于二月花》的寫作，但原計劃的三部，只完成了一部。原計劃的作品很宏偉，從完成的一部看，藝術上也比他的《子夜》差。一九四八年，茅盾又寫了一部反映抗戰的長篇《鍛煉》，可惜也沒有全部完成。

二、老舍的《四世同堂》

抗戰時，老舍離開妻子和兒子，參加抗戰文化工作。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他來到重慶，主持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工作，這時期，他創作了《殘霧》、《面子問題》等劇本，長篇小說《火葬》、短篇小說集《火車集》等，詩集《創北集》等，通俗文藝《三四一》。一九四三年九月，老舍的夫人胡潔(jié)青，逃出了日本軍隊占領下的北平，和孩子們一起來到重慶。胡潔青給老舍講了在這四五年里，北平人民在日本人統治下的生活。從一九四四年開始，老舍根據他夫人的見聞，寫成了一百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這部小說共分三部分，因規模宏大，現實主義特色突出，成了四十年代整個國統區小說創作的代表作品。

從整個抗戰小說的創作情況看，《四世同堂》發展出了一個新的題材，它反映了在敵人占領的大城市中，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抗戰情況。作品講的是“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缺投降這八年時里，北平普通人的苦難生活，作者選擇了北平的一個最有地方特色的胡同（ซอยก์กุนจุนท์）。這個小羊圈(juàn)的胡同里，住着各種行業的人家，他們的活動，代表了被占領的北平人生活。小說寫民族災難的深重，處處可以看出作者對國破家亡的痛心。“七七”事變後，在這個北平成千上成的小胡同里，發生了一連串的悲劇。詩人錢默吟一家財破人死，洋車夫小崔被砍了頭，藝人小文夫遭到殺害，剔頭匠(ช่างผูก)孫七被活埋。好一點的是齊家，祁(qí)家四世同堂，即一家四代人住在一起，是傳統上一個安樂完美的大家庭，看來生活還不錯，但也沒有逃出悲劇的命運。對這一家的描寫是小說的中心。

作品的重大價值是，它不僅從政治和社會方面，分析了民族悲劇命運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也從文化方面引起人們的思考，這是一個更深層的原因。

《四世同堂》里寫出了小羊圈胡同里各種人不同的文化心態，典型地反映了中國的傳統民族文化心態。祁家的最上一輩初老人，是這個胡同里的一位品德正直，很影響的人物，他一輩子相信“磕(kē)頭說好話”，就是不得罪(ส่องเกิน)別人，自己過安定日子的生活哲學，并把它傳給了后代，形成“祁家文化”。但在敵國占領下，現實使祁老人慢慢地明白了，“磕頭說好話不見得準有好處”，他對自己信了一生的生活哲學開始懷疑了；“祁家文化”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孝道”，這個文化特征使瑞宣不能勇敢地離開家。他是這個大家庭的長孫，當教師靠本事吃飯，恨侵略者和漢奸，原意為國難去死，他說“把所有的血都流淨也比被征服強”，但封建的倫理“孝道”，使他不得不留在了北平，無法去參加偉大的抗戰。他也像巴金的《家》里覺新一樣，在家維持生活，他爺爺的理想就是“四世同堂”。當時有多少人，就是因為這種傳統的家庭觀念，不能去為國家服務。老舍認為，這是民族文化不好的方面，它影響了抗戰工作。

《四世同堂》當然也寫了民族文化好的方面，表現了民族的自信，這就是“錢家文化”。錢默吟原來是一位舊式的知識分子。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澆花、看書、畫畫和寫作舊詩，高興時就喝兩杯自己泡的陳酒。不僅對政治毫無興趣，對人也都是不冷不熱，“維持着相當距離”，但他有着傳統的知識分子愛國主義思想，當國家受到侵略時，他把愛國看作是一個人的生命。他說：“北平若不幸丟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了”，抗戰爆發後，他的“隱士”生活也就結束了，而成了一個愛國的“戰士”。他“忘記了他的詩、畫、酒、花草，和他的身體”，為抗戰積極工作，決心戰到最后一滴血。通過“錢家文化”，即錢默吟抗戰前后的變化，老舍向人們說明：中華民族是不會消亡的，只是中國人的文化心理，還需要社會環境的改造，保留好的，丟掉不好的。

老舍的寫作是最善于描寫人物的，這在《四世同堂》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人物描寫的多



《四世同堂》插圖 丁聰作

樣性，超過了以前任何一部分作品，有人統計，全書寫了十七、八戶人家，一百三十多個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個，可以說，當時北京社會的上中下層，各種人物在這八年里，都在他的筆下走了一趟，而且都有自己的性格，有不同的典型意義，這就是《四世同堂》藝術上的特點。小說也有明顯不足之處。老舍很熟悉北京生活，在寫作時也進行了調查和研究，但他沒有親身體驗所寫的北京，所以，有些形象只好從自己的思想出發，這必然破壞了真實感，使人常常覺得作者在替人說話。另外，小說中寫的北平，與整個抗戰的全國形勢也沒關係，寫了一座孤城。

第二節

巴金《寒夜》、蕭紅《呼蘭河傳》中，可憐可悲的小人物和錢鐘書《圍城》中一群可笑的知識分子

一、巴金的《寒夜》

抗戰初期，巴金完成了他“激流三部曲”中的《春》（一九三八）和《秋》（一九四〇）兩部長篇。這兩部小說的人物故事，都是按着《家》里的，主題也都是同樣的，即揭露封建家庭的罪惡性。但《春》和《秋》更主要是寫青年人的生活，對封建家庭關係寫得沒有《家》那么多。《春》里寫了高家下一代兩個女孩子的命運。一個女孩子是接受家庭安排的婚姻，婚后生活不幸福，憂愁而死。而另一個女孩子淑英，在覺民、覺慧的支持下，反抗家里包辦的婚姻，逃出了家。表示青年人只有鬥爭，才有幸福的春天。《秋》寫在新的時代潮流下，覺民等青年人的活動更加活躍，另一方面，高家的老一代人繼續那種腐爛的生活，封建家庭更加沒落，像秋風吹落的草木，“家”就要全面崩潰了。因為巴金寫《家》時，并沒有《春》、《秋》的計劃，所以和《家》相比，這兩部在情節上沒有多大發展，思想和藝術都沒超過《家》，在三部曲中，影響遠不如《家》。

隨着抗戰發，巴金更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生活，使他的創作和思想發生了變化。長篇小說“火三部曲”的寫作，說明了他的眼光已從家轉向了社會。到一九四四年，社會現實使他的思想進一步成熟，反映在創作上，就是現實主義更深化了。小說《憩園》和《寒夜》就是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憩園》是通過一個花園主人的變換，把對兩家的描寫聯繫起來，一家的悲劇剛剛結束，另一家的又開始了，從而批判了家庭和社會。

《寒夜》不僅是巴金四十年代的代表作，也是整個國統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寒夜》最突出的成就，是創作出了三個具有高度典型意義的悲劇形象。寫封建大家庭的悲劇，是巴金很拿手（*เขี่ยวชาญ ถนัด*）的，但這次的和以前又不同。

《寒夜》主人公汪文宣，是一個受社會損害的小公務員形象。他上大學時，學的是教育，曾在教育上干一番事業的理想，但後來卻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一家圖書公司去，當了一名校(jiào)對員(ผู้พิสูจน์อักษร)。他的痛苦是來自多方面的，一是生活貧窮，他工作努力，但物價長得快，所以，書管累得受不了，帶着病上班，但工資還是不夠一家人生活。他為人老實、小心，卻被別人欺負，失業時刻威脅着他，使他內心很痛苦；二是身體上的痛苦，他的病是咳嗽、吐血、為了治病，他不得不讓妻子去銀行工作，當“花瓶”賺錢，讓母親去買家里的物品，這使他精神更痛苦；三是家庭關係帶來的痛苦。他母親和妻子不斷地打架吵嘴。他一方面愛“新派人物”的妻子，另一方面又要孝敬(กตัญญู)守舊的老母，他們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他只好夾在中間受兩面的氣。

汪文宣的妻子曾樹生，是一個性格矛盾的知識女性。她和丈夫結婚前是有共同理想的，婚后，她受雙倍的壓迫。一是來自社會，一是來自婆婆，最後她再也無法忍受，寫了一封長信，對汪文宣說出了自己生活中矛盾的痛苦，跟銀行經理，去了蘭州。

汪文宣的母親是這個家庭悲劇的重要原因。她受過的是傳統的封建教育，她和兒媳的矛盾，表現了兩種文化心理的衝突。汪母思想極守舊，認為婆婆，丈夫就應該管教媳婦。首先，她就不滿意兒子這種自由戀愛的結婚形式，不承認這個婚姻。另外，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兒媳婦進咖啡館和舞廳。她甚至叫兒子和曾樹生離婚。但巴金也寫了她善良，吃苦耐勞的傳統美德。這樣，使人物形象更可信。受舊習俗的害，自己不知道，又去害兒媳婦，這更使人感到她悲劇的社會性，她認為自己所做的是愛兒子，不知道實際上加快了兒子的死。



根據巴金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寒夜》

《寒夜》在思想方面，也有很明確的政治傾向，寫家庭悲劇，實際上是社會悲劇，揭露黑暗，使人們不要再對這樣的社會懷有信心。

《寒夜》在藝術上，也發展了巴金擅長描寫人物心理的特點，他已經不像早期作品那樣，在作品中，接直地、長段地寫充滿感情的話，以前表現人物內心活動的方法，如通過寫信、內記等，也用得少了。而是另外找新的技巧。一是通過心理分析，如錯覺、幻像（ກາພລວງໝາ）、作夢等。如寫汪文宣盼望母親和妻子的理解，能一起回家，他等在家門口，竟把一對男女看成是母親和妻子，笑着迎上去，這就是利用錯覺的心理分析方法，表現人物的心理表情；另一個利用環境襯托的心理描寫技巧。如當妻子出走時，汪文宣追出門外。作者寫在牆角下，看見兩個小孩，抱在一起互相取暖，間接地表現了汪文宣這時的心理。作者寫“寒夜”，既是寫自然，也是寫人物的心理感覺。正是因為寫出了人物真實豐富的心理世界，作品中的形象才能活起來，有生命，在藝術上也就有了吸引人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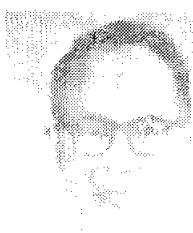
巴金對黑暗社會的認識，還表現在長篇小說《第四病室》。他寫完這部解放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中去了。

二、蕭紅的《呼蘭河傳》

蕭紅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來到香港，十二月寫成了她的最優秀的長篇《呼蘭河傳》。呼蘭河是作者的故鄉，這是一部回憶童年生活的小說。作品的主角不是人物，而是呼蘭河小城、隨着作者的回憶，我們就好象翻開了一本畫冊，一幅幅的風土畫、世俗畫展現在眼前。在這座死氣沉沉（ເງິນວ້າງນໍາສລດ）的小城里，有苦苦生活，掙扎着各種人物。這里古老、平靜、閉塞，這里的人們幾千年來，按照古老的習慣，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壓力下，生老病死，過着單調（ເງື່ອບໜ້າ）而悲酸的生活。作者通過一件件生活里的平常事，和互相沒有關係的故事，寫出了人們善良的本性和頑強的生命力。他們不欺詐（ຫລອກລວງ），不虛偽，也不好吃懶做，極容易滿足。蕭紅是在大病中，帶着含淚的微笑，回憶着這遙遠、寂寞的北方故鄉小城，這里的一切，對她都是清晰和親切，通過憶舊，表達了她對日本侵略者統治下的故鄉的深情思念。整部小說共七章和一個“尾聲”。各個故事相互沒有聯繫，結構看上去很散，好像一部部集在一起的短篇，但從全書總的主題和風格上看，還是有個內部的統一性的。語言上，比早期的《生死場》更熟練，描寫很有女作家特色。在四十年代長篇小說中，因為寫得優美動人，別具一格，獲得了很高的評

譽(ខ្សោតិ៍)。

三、錢鍾書和他的《圍城》



1. 生平簡介

錢鍾書，江蘇無錫人。他是著名古文家錢基博的長子，自小就受到傳統經史方面良好的教育。一九二九年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又開始了廣泛地接受世界各國的文化學術成果，一九三三年大學畢業。一九三五年，他同作家、翻譯家楊絳(jiàng)結婚，同時考到英國留學名額，先在牛津大學學過兩年英國文學，又到法國巴黎大學學過一年法國文學，一九三八年回國，先後在大學和圖書館工作。一九五三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屬北京大學)研究員，一九八二開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錢鍾書深入研究中國古新書史學、哲學和文學，將中西文化和文學做過許多有意義的比較、他的《談藝錄》(一九四八)、《管锥篇》(一九七九)、《也是集》(一九八四)等許多著作，都達到了極高的學術水平，獲得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他學風嚴謹，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是中國現當代少有的一位真正的大學者，受到中國學術界普遍的尊重。他同時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有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一九四一)、短篇小說集《人、獸、鬼》(一九四六)。他的文學方面代表作《圍城》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2. 長篇小說《圍城》

《圍城》寫于一九四四——四六年間，正式發表于一九四七年五月，是一部風格特別的現實主義長篇諷刺小說。《圍城》一發表，就引起很大轟動，不但在市場熱銷，在學術界也有很高評價，被稱做是一部新《儒林外史》。

作品諷刺了一九三七年夏到一九三八年冬這段時間里，一群遠離抗戰的上層知識分子生活。正在全國人民熱情抗戰，為國家流血犧牲時，這群大部分留過學的知識分子，卻在大后方，為權力和女人忙着，這樣“灰色”的知識分子，在那時是大量存在的。錢鍾書長期在大學工作和學習，對他們是最熟悉了，對筆下人物內心深處的揭露也就最徹底(ពະລຸບຽນປ່ອງ)。全書中除了最開始部分出現一個叫唐曉芙(fù)的女孩外，對所有的人都採取了諷刺、嘲笑的態度。

在《圍城》里，曾留學各國的人物中，方鴻(hóng)漸和趙辛楣(méi)還有真誠的一面，其他的留學生就都是心靈骯髒、行為不光彩(សំដែរដៃយេ)的人物。那個“哲學家”褚(chǔ)慎明，他的名聲是靠和外國著名學者通信和見面獲得的；大學校長高松年，自稱是一位研究生物學的“老科學家”，實際上卻是一位毫無學問，好酒好色(ខ្សោចាត់ខ្សោ)的可耻官僚，由他來領導這所腐敗的大學倒正合適。像他們倆位這樣品德的人物，小說中還有很多。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的蘇文紳(wán)小姐，自己感覺是一位“才貌雙全”的“女詩人”，她最滿意的一首詩作，竟是抄的德國民歌；而另一位學成歸國的“詩人”曹元朗，他的“杰作”《拼盤姘伴》，更使人惡心(កេតិឱណា)，哭笑不得。這一男一女最後成了夫妻，更是諷刺。大學教授韓學愈，從美國愛爾蘭騙子那里，買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克來登”大學的博士學位，為了講自己的俄羅斯太太當英文教授，昌充(ແອបចាំង)是美國紐約人。對那些沒有留過學的中國“土產”知識分子，作品也都一一進行了嘲笑。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李梅亭，他從上海去大學報道時，那支大皮箱里裝滿了卡片和西藥，卡片是為了“作學問”時抄的，藥是想賣了賺錢的。到了大學後，他利用手段當了官，又去上街找妓女，還能免費。其他的“土產”知識分子，除了方鴻漸的父親外，像陸子蕭、顧雨謙、

汪處厚等人，也都是政客不政客，學者不學者，真面目是騙子和流氓。

《圍城》里的中心人物是方鴻漸，作品多方面描寫，他充滿喜劇情節的悲劇命運、他出生在一個紳士地主家庭，名義上的岳父(ພ່ອດາ)周經理出錢讓他留學，他在國外游玩了四年，為了周經理的美意，他又買了一張“克來登”大學的假哲學博士文凭。但他和韓學愈不同，心里對這種行為一直感到不安和自責。他在回國的船上，和一位鮑(bào)小姐住在了一起。回到上海，到周經理的銀行做事，很快就陷入了和唐曉芙與蘇文純的愛情“圍城”的麻煩中，得罪(ສ່ວງເກີນ)了女友和周經理，同時失去了愛情和工作。因為好友趙辛楣的介紹，和另一個女孩子孫柔嘉一起來湖南三閭大學任教。大學里各派別鬥爭激烈，他終於被擠了出來，在香港和孫柔嘉結了婚。回到上海後，他有了妻子、家和工作。卻又陷入夫妻的感情矛盾中，孫柔嘉也離開了他。為了愛情、婚姻和工作等，方鴻漸在各種“圍城”中不停地追求，苦斗。

關於“圍城”的意思，作者用小說中人物的說話，結婚好像金絲鳥籠，外面的鳥想進去，里面的想飛出來；也象被圍的城，城外的人想冲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方鴻漸的性格中是好壞兩方面都有。他看不慣別人的各種虛假，他本人也沒有太大的才學，卻好顯示小聰明。但他本質上不壞，無害人之心。他最大的問題是生活中沒有追求的目標，不能勇敢地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又生活在一個處處都有“圍城”的社會里，所以，他的愛情、職業總有苦難和失敗，逃不出“圍城”。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性格軟弱(ອ່ອນແຍ)的一種表現。除方鴻漸，孫柔嘉和趙辛楣是另外兩位性格最完整的形象。

錢鍾書學問淵博，智慧極高，加上他對舊中國知識界的深刻觀察，有所感才寫在小說中表現出了很不一般的諷刺才能。這種嘲笑的方法，又不是浮淺的，而是充滿了智慧和哲理，引起讀者對人生意義的思考。

第三節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黃谷柳《球傳》等長篇小說全面暴露國統區黑暗。

一、路翎和他的《財主底兒女們》

1. 生平簡介



路翎(一九二三——)南京人，出生于商人家庭。很小說失去了父親，繼父是小公務員。一九三八年，因抗戰，全家從南京逃難到重慶，路翎這一年在四川上中學，因辦報被學校開除。一九四〇年在四川天府煤礦當辦事員，開始考察礦工生活，為從事創作作了準備。同年在胡風主辦的《七月》上，發表小說《“要塞”退出以後》，引起文藝界注意，此后，路翎不斷在胡風主持和影響下的刊物上發表作品，先後出版《青春的祝福》(一九四五)、《求愛》(一九四七)等多部短篇小說集，以及《饑餓的郭素娥》(一九四三)、《蝸牛在荆棘上》(一九四六)等中篇小說。一九四三年出版《財主底兒女們》下卷，一九四五年又出版了上卷。

解放後，路翎專門從事創作，出版有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和戲劇，一九五五年，因為所謂的“胡風集團案”，被捕入獄，被迫停筆。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又重新開始寫作。

路翎是“七月派”代表作家，解放前的作品，帶着強烈的主觀色彩，努力描寫在新舊社會急速變中，人物的內心世界。這與他生活的時代有關，他創作的活躍時期是在抗戰中，后期和解

放戰爭時期，他的小說和戲劇都是現實主義的。解放後，一九五二年至五三年，他曾到朝鮮戰場前線，創作的短篇小說《窪(wā)地上的戰役》、《初雪》等，在主題方面有鮮明的獨創性，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也因此受到誤解和不公正的“批判”，使他失去了近三十年的藝術生命。

2. 長篇小說《財主的兒女們》

《財主的兒女們》的社會背景，是從“一二八”上海抗戰到蘇德戰爭爆發，這十年間的中國社會。它描寫了蘇州最富有的封建大地主蔣捷三一家的消亡過程，集中寫了財主的兒女們，即出生在封建大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新時代社會中的變化，反映了封建地主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痛苦經過。作品的結構相當宏大，如一部史詩，十年間中國所發生的大事，如“一二八”抗戰、偏“滿洲國”成立、華北危機、長城杭戰、北平學運、西安事變、汪精衛賣國、南京失守、遷都重慶等，小說中都有描寫；人物有七十個以上，官吏、士兵、紳士、商人、學生、農民、工人、甚至還有退黨后的陳獨秀、投降日本前的汪精衛；人物活動的地方，由蘇州、上海、南京、江南原野、九江、武漢，一直到戰時首都重慶和四川的偏遠山村。

作品的上部時間是從“一二八”上海抗戰，到“七·七”“盧溝橋事變”，故事中心是蔣家在內外各種力量的影響下崩潰的過程。蔣捷三在江蘇有龐(páng)大的產業，在南京有很多土地，在上海的工廠里有很多股份 (ຫຸ້ນ)，他還收藏有大量古玩(ວັດຖຸປອບຮານ)金銀珠寶和綾羅綢段。作品第一部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了蔣家生活上的豪華浪費，特別是女兒們爭奪家庭財產的鬥爭。第二部從抗戰開始到蘇德戰爭爆發，主要寫蔣家小兒子蔣純祖，在動亂時代中，曲折的生活道路和痛苦的生活經歷。

在這部作品中，路翎的主要力量，在描寫蔣家三個兒子的活道路上，把他們作為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大兒子蔣蔚(wèi)祖，是舊式知識分子，而二兒子蔣少祖，是個“新派”人物。蔣蔚祖是聰明漂亮，因為能寫一手好詩文，受父親蔣捷三喜愛，實際上是一個無能的富家子弟。他既要安慰(ປລອບໃຈ)“父親的孤獨和痛苦”，又不能傷害“妻子的熱情和願望”，妻子與父親展開了激烈的財產鬥爭，他內心充滿了復雜的痛苦，完全被這潑(po)辣(ມູກະລຸດວ້າຍ)大膽的妻子控制住了。他迷妻子的美麗、又不能忍受她生活的放縱(ທາມອຳເນວິຈ)，最後發瘋，放火燒掉房子，離開家成了要飯的乞丐，當他知道妻子又和別人結婚時，就跳入長江自殺了。蔣少祖是蔣家“第一個叛逆(nì，ທ່ຽຍສ)”的兒子，他狠恨舊家庭而出走。從日本留學回來後，他從事民主運動，熱烈地追求自由和個人英雄主義，“勇敢地走向現代文明”。他同陳景惠自由戀愛結婚，辦報紙、寫文章，參加抗日愛國運動，在政治界和知識界都很有影響。但是，他性格的特點是自私、虛偽。這使他後來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一個政客和傳統封建文化的復古派。由現代到復古，由進步到退步，這不正是中國近代許多知識分子走過的一條路嗎？

三兒子蔣純祖是作者用全力描寫的人物。他性格孤獨、高傲(ຫຍິ່ງຍະໂສ)，始終追求自己選定的生活道路，又始終苦悶、彷徨。他年輕時就是一個積極向上的知識青年，很早就和家庭沒有了實際的關係。他先在上海參加抗戰，危險時逃回南京，南京被占領，他和難民們一起，開始了流浪生活。到武漢，他參加了抗戰演出隊。在劇團里，和領導關係不好，和女演員高韵的愛情關係也破裂。他身體多病，生活窮困，朋友請他離開重慶，到鄉下去教小學。在那裡，他和同事們一起，同當地的地主流氓鬥爭，被迫回到重慶，住在姐姐家中，又受不了姐姐家中生活沉悶(ອີດວັດ ກລຸ້ມໄຈ)的氣氛，想回到農村小學重新開始自己的事業，但疾病到了晚期，終於在那裡淒涼地死去。

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蔣純祖是性格最雜，思想鬥爭最激烈的人物之一，他的悲劇性生活道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抗戰時期，進步、愛國的知識分子的革命性、狂熱性、

(បាបីន) 和軟弱性。作者對他的描寫，是忠于現實主義的。他個人奮鬥失敗，是因為他遠離廣大人民，作者對這種個人英雄主義是同情贊美，從這我們也可以看出，路翎那時的思想傾向。

二、黃谷柳和他的《蝦球傳》

1. 作者簡介

黃谷柳（一九〇八——一九七七）出生于越南廣寧省的一個華僑家庭，從小和母親住在雲南外祖家。一九二四年考入雲南省第一師範學校，1927年，他從海路去武漢，考軍政學校，因為“四一二”政變發生，被迫留了香港，當時靠寫作生活。一九三一年，因生活太難，曾在廣東參加國民黨部隊，抗戰爆發，開到前線與日軍作戰，親身經歷抗戰現實。以後，他在廣州認識了夏衍等幾位著名進步作家，發表了反映抗戰的短篇小說《干媽》等。一九四一年，黃谷柳自動脫離部隊，在廣東、重慶等地從事抗戰宣傳工作，創作轉向揭露。中篇小說《楊梅山下》和獨幕劇《牆》，是他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一九四六年春，因痛恨蔣介石發動內戰，帶領全家到香港，開始艱難的賣文生活。

2. 長篇小說《蝦球傳》

《蝦球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華商報》上連載，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成為解放戰爭時期，華南最受歡迎的通俗小說，并很快就被拍成電影，翻譯成了英語和日語。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說很多，但關於城市流浪兒和流氓黑社會的卻很少，在這方面，《蝦球傳》的出版，是引人注意的。主人公蝦球原名夏球，是一個善良，勇敢的城市流浪少年。他還沒出生，父親就作為勞工去了美國，母親在香港當家庭紗工，收入不夠兩個人吃飯。蝦球從小當童工、小販，十六歲那年，他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生活，離開家里去流浪，落入黑社會之手。他進過監獄、當過小偷，被抓過丁(ព្រោះបង្កើតមុនការ)搶過東西，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賭博(អណ្ឌ)，在他身上傳上了黑社會的各種壞毛病。但另一方面，他也一直想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做一個正常的，有用的人。最後，小說寫他回到廣東找到游擊隊，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小說以蝦球的流浪生活為線索，揭露了香港地下黑社會的一個角落。刻畫了很多有獨特性格的人物，展現了那個奇怪社會中最底層人的生活。小說對流氓頭子鰐(è)魚頭的描寫生動、真實，他的發迹(វារោយខែងមា)過程，以及最後消毀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里，都讓人想起蔣介石的生活道及他的集團的結局。

小說的情節曲折，故事性很強，加上濃濃的南國地方色彩和生活氣息，通俗小說特有的驚險、神密描寫，使小說很吸引人。在學習西方流浪漢小說的藝術方法時，有批判、有創新。西方這類小說的主角都是一些看破現實，嘲弄(លាងដោយ)法律的英雄，他們雖被擠出了這個正常的社會，但作者寫他們犯法，只是對社會的一種消極抗戰，並不寫他們造反，推翻這個社會。蝦球是即不滿舊的世界，又向往新的世界，最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見，作者要表達的主題，絕不只是讓人們行善，壞人最後不得好下場。小說的成功之處還在于，作者在情節設計，人物描寫方面，大量吸收古典章回體小說的傳統，創造出了一種為廣大普通市民所喜聞樂見的通俗化形式。這部小說在結合西方現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為文學大眾化做了很有意義的新嘗試。

二、張恨水和他的《紙醉金迷》

1. 作者簡介

張恨水（一八九五——一九六七）生于江西。原名張心遠，后根據古詩名句“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改名張恨水。青少年時期主要在江西讀私塾，喜讀古典章回小說和傳統戲曲作。十九歲時，因不滿包辦婚姻，離家出走，在江南一帶流浪，并開始發表一些文言和白話的章回小說，表現出了極強的想象能力。一九一九年，他到北京從事新聞工作，幾年新聞工作，使他了解到不少社會情況，使他創作了長篇小說《春明外史》（一九二四），在報上連載達五十七個月。一九二六年又發表了《全粉世家》，描寫北京一個姓金的內閣總理大家族的興衰史。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報紙上連載的《啼笑因緣》，是張恨水早期最優秀的張回體小說。內容是以富家少爺樊（fàn）家樹為中心，構造了一個多角戀愛關係，又加進了軍閥霸占民女，以及武藝高強的關氏父女除強扶弱的傳奇。作者把富有者有行善和武藝人的個人反抗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的手段，使一時找不到出路的小市民得到了暫時的興奮，加上情節驚險緊張，所以發表后在市民階層大受歡迎。在很長時間內，為最暢銷的小說，還被改編成戲劇、評彈和電影。

張恨水前期創作主要是風花雪夜式的詩詞和風流浪漫式的小說，受元代和清代言情遺責小說的影響很深。故事都輕松熱鬧，而又情調感傷（ เนื่องรักโรแมนติก ），沒有“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現實精神，社會意義也都不大，卻有很大消遣（ บันเทิง ）意味，很能引起小市民讀者層的興趣。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加深，也激發了張恨水的愛國意識。他說：“今國難當頭，必以語言文字，喚醒國人”，他開始了以抗戰為題材的一系列“國難小說”的創作，但開始時，雖有好的願望，但沒有生活，仍是“抗戰+言情”的老路。

抗戰正式爆發后，他到武漢，再去重慶，一九三九年寫的中篇《蒼戰之夜》（又名《街鋒》、《天津街》），寫日軍在占領天津時的血戰，熱情描寫下級官兵和天津市民，很引人注意，寫作風格有了大的變化。抗戰期間，張恨水還寫下了《八十一夢》（一九三九）、《五子登科》（一九四七——一九五六）等很有進步立場的社會風刺小說。一九四六年創作的《紙醉金迷》是他揭露黑暗小說的代表作。

張恨水是中國通俗小說由近代走向現代的代表作家，在這方面有很大貢獻。他早年接受新思想，自稱維新青年，革命青年，但身上也保留了很深的傳統文化價值觀。使前期創作沒有跟上時代步伐，遠離了現實。新中國成立后，張恨水繼續又學創作，作品多發表在香港的報刊上。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少數幾個多產作家之一，以小說為主，有近一百部，自己說一生共寫了三千萬字。

2. 長篇小說《紙醉金迷》。

一九四六年完成的《紙醉金迷》，是張恨水一系列揭露國統區現實的代表性作品。小說背景是抗戰勝利前夕的重慶。主要人物是田佩芝。她是一個墮落（ ตกต่ำ ）的風流女子。為追求紙醉金迷的生活，背離了自己當小公務員的丈夫。作品就以田佩芝的活動為線索，無情地揭露了國民黨政府控制黃金價格，用黃金進行投機（ ฉวยโภคภัย ）活動。這是一種搜



張恨水在書房中读书

刮民間財富的犯罪行為，這些上層社會的政府官員，不顧國家的災難，在戰時首都“覆重慶”，忙着搶購黃金、賭博、玩女人，暴露出了種種瘋狂心態。作者同時對生活在寒冷饑餓中的下層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作品結構很大，線索復雜。作者通過善于描寫的激烈矛盾衝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銀行家、投機商人、政府官員，以及小公務員，妓女等形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統區奇怪而 雜的社會，揭示出了這樣的統治難于長久的一些趨勢。

三、沙汀和艾蕪的長篇小說

一、沙汀的《淘金記》

前面談到，沙汀抗戰初期的代表作是《在其香居茶館里》。到了這一時期，沙汀的長篇小說創作又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著名的“三記”《淘金記》、《困獸記》和《還鄉記》，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層示了這一時期中國農村的歷史書卷，創造出了一批相當成功的人物形象。這三部長篇分別創作于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八年。其中以《淘金記》最為著名。

《淘金記》的背景是抗戰後期四川後方的小鎮，叫北斗鎮；線索是開采“燒箕(qí)背”金礦。作品就以采礦事件為中心，暴露那里的地主鄉紳，為發“國難財”而展開的內部爭斗，畫了一幅各有性格特色的地主階級群：圖。燒箕背金礦正好在地主何寡母家祖墳的山上，這位守舊的地主婆，為了何家的“風水”，堅決反對開礦。爭奪金礦開采權的是林么(yāo)長(cháng)子，他是當地哥老會的流氓頭子，另一個人是依靠地主上層勢力的惡霸白醬(jiàng)丹。這三方面的勢力都是不一般的，各不相讓，就有了好戲看。爭鬥結果，白醬丹聯合了聯保主任，就是今天的鎮長龍哥和地主商人彭胖，以後又聯合縣里官方人物，有了政府的保護傘(ร่มกันบัง)，他一方面擊敗了林么長子，另一方面又使何寡母屈服，取得了“合法”的金礦開采權。就在白醬丹很得意滿足，只等錢來時，龍歌和彭胖卻偷偷地退出了開采金礦的股分公司，原來他們發現，趁着戰爭，把錢用來囤債(กักหนุน)糧食，可以賺到更大的錢，白醬丹也只好跟着他們去做這個賣賤，做了半年，就暴富起來。而在這場官司中，孤立無助的何寡女，祖墳被挖掉，又要賠償(ขาดใช่)一千五百元的巨款，她又凶狠地把這個損失轉到農民頭上，加重了農民的苦難，成了真正的受害者。

沙汀最注意描寫的是白醬丹和龍哥這兩個人物。白醬丹是個沒落的地主。他表面知書禮貌，“和藹可親”，內心里卻藏着陰險(เล็กเหลี่มโหดเหย่)狠毒，“吐出的口沫連魚也能毒死”。他是聯保主任龍哥的“智囊(náng)”，即暗地里出主意的人。他表面上說的都是大公無私的美詞，什麼生產、治安、後方支援抗戰等等，實際上，沒有一件事不是為了自己“私利”。他正是那種社會里培養出來的無恥的政治流氓。而龍哥原來是工匪頭子，後來受了政府招安(เหล็กกล้มให้กันให้กัน)，當上了民間幫會勢力“袍哥會”的領袖和聯保主任，在北斗鎮，他有土匪頭子的膽量、幫會的勢力和政府的權力，貌不二(พูดคำให้ฟังคำฟัง)，他就是法律和公理。他“心直口快”，沒人不怕他，因為他就是本鎮的土皇帝，什麼都敢說敢做，而且憑他的手段，沒有不勝利的。他是沙汀筆下眾多聯保主任中，最有特色的一個，在他身上反映了地方政權的黑暗。

從《在其香居的茶館里》到《淘金記》，沙汀最愛表現的是農村中，地主紳士和他們支持的地方政權代表人物之間的矛盾。這一方面說明，沙汀在這方面有深厚的生活積累，另一方面，通過這些人的狗咬狗的內訌(hòng, สู้กันเอง)，讓他們自己互相揭露，能最有力地表現出農村社會的全部丑惡和黑暗。

二、艾蕪這一時期生活仍不安定，但他在極其艱難的生活中，創作了大量的作品，浪漫主義的因素減少，暴露和諷刺現實黑暗成為主流。艾蕪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作，是三部長篇小說

《富饒的原野》、《故鄉》和《山野》，中篇小說《一個女人的悲劇》和短篇小說《石青嫂子》。

《故鄉》是一部五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也是艾蕪這一時期最要的作品，完成于一九四五年。作品的主人公余峻(jnū)廷出身于地主家庭，他大學畢業后從上海回到故鄉——四川一個邊遠縣的城鎮，相干一番抗日救國的大事業。但他把這個縣域的復雜的社會關係和矛盾，想得太簡單了。又加上他缺乏鍛煉和意志，最后在重重阻礙(อุปสรรค)面前，灰心失望(ท้อแท้ใจผิดหวัง)，氣憤地離開故鄉，另找新路。小說通過余峻廷這二十多天家鄉干事業的經歷，刻畫出了一批統治者的典型形象。如當權人物余松一，高利貸者(บุลลย์เงินกู้ดอก)余老太太，大投機商人蔡興和豪紳地主龍成恩等，他們都在這里借抗戰的機會，忙着大發國難財，哪里還想到抗戰。作者也寫了一個正面人物，那就是敢于和這些反動勢力鬥爭的農民雷老恆，但也失敗了。

《富饒的田野》是艾蕪根據自己對故鄉生活的回憶，寫成的三個系列的中篇小說構成的，主人公是三個同為地主汪二爺當長工的農民。

《山野》是一九四七年的作品，是當時國統區抗戰小說中最好的長篇之一。寫的是在一個小小山村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和日軍一天的戰斗經過。作者把一個長篇故事情節壓縮在一天一夜裏，主要描寫了 村長，也是地主商人茂和一家。通過一家人的活動，寫出了不同階級對抗戰的態度。

《一個女人的悲劇》是艾蕪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中篇小說，周四嫂的丈夫周阿四，被抓去當兵，她一個人，要養活有幾個孩子的窮家庭，她在鄉長、地主、商人、鄉兵，甚至巫婆(แม่มด)的欺騙、剝削下，兒子病死了，她和兩個女兒在這個“鬼世界”，實在活不去了，就爬上山崖(yā)，抱着兩個女兒跳下去自殺了。小說通過周四嫂的悲慘遭遇，使人看到，這些農村富人剝削窮人，連這樣一個可憐的女人也不放過。在著名的短篇《石青嫂子》中，艾蕪也寫了另一個有著同樣不幸的農村婦女，但石青嫂子變得敢于反抗命運，她決心當乞丐，也堅強地活下去，為了把五個孩子都帶大。在石青嫂子身上，體現了中國勞動婦女的美德。

第四節

抗戰國統區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和諷刺劇的繁榮

一、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現代歷史劇的創作，達到了最繁榮的階段。由於現實的需要，四十年代歷史劇作者選的歷史事件，如戰國時代的六國聯合，反抗秦的侵佔，或明末清初的反清鬥爭等都有現實針對性和政治性。

郭沫若是四十年代歷史劇創作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一九四二年一月完成的《屈原》，既是郭沫若最有名的歷史劇，也是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的一部杰出的浪漫主義作品。最初演出時，轟動了整個重慶，郭沫若對中國戰國時代偉大詩人屈原，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認為屈原是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的，在當時受到楚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政治上失敗，最後看到國家滅亡，在悲痛憂愁中投江自殺。在劇中，屈原看破了西方強大的秦國，要吞併(กลืนกิน)其他六國的野心，堅決主張在南方的楚國，聯合東方的另一個大國齊國，共同抵抗秦國的侵略，但楚國宮中南后鄭袖和權勢最大的官員靳(jìn)尚等一伙人，看到這樣會損害自己的利益，便暗中勾結秦國派來的大使張儀，使楚懷王作出了錯誤的決定，斷絕和齊國的關係，而與真正的敵國齊國發展關係。他們還把愛國無私的屈原看作是自己控制權力的仇人，一定要除掉，就采用卑鄙(bēibì，ต้าช้าเจวาราม)的手段來陷害(ใส่ร้าย)他，給屈原加了一個罪名，把

他罷官、流放(เนรทวี)、囚禁。但屈原處在這種艱難情況下，他愛國愛人民的心情更憂愁，同鄭袖等投降派鬥爭也更堅決。他沉痛地勸楚懷王，不要丟掉和齊國聯合的正確策略，并斥責(ต่อว่า)鄭袖：“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們的國王，是我們的楚國，是我們整個的赤縣神州呀！”

《屈原》沒有特別表現屈原的政治才能，也沒更多地描寫們和鄭袖張儀等人的正面鬥爭。而主要寫的是屈原在極困難的處境中，受侮辱、受迫害，仍表現出崇高的政治理想，關心的是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絲毫不顧個人的權力、富貴等。他堅定維護抗秦主張，同投降派作了不屈服的鬥爭，他性格光明正直，沒有一點奴顏媚(mèi)骨；另一方面，他又有詩人火一樣的激情，最后一幕中那段充滿正氣的《雷電頌》，把屈原憂國憂民和掃除黑暗，追求光明的激情，象山洪(น้ำตกไฟลากาภูมิ)一樣暴發了出來。歷史上的屈原，并沒有寫過《雷電頌》，這是郭沫若借屈原之口發出的“時代的憤怒”。在這場保衛祖國的抗戰中，屈原代表了中華民族爭取自由，反抗侵略的民族性格。

《屈原》還成功地刻畫了兩個性格完全相反的女性形象：鄭袖和嬪娟(chán juān)，嬪娟是歷史上沒有的人物，是作者根據屈原作品，想像出來的。她美麗純潔、天真善良，象月亮一樣映襯(chèn，เม้มส่วน)着屈原這個太陽。是屈原形象的補充，也是鄭袖形象的對照。鄭袖雖然外表也美麗聰明，但在嬪娟的人格對比下，就更顯出了心狠手毒，無恥自私、賣國害人的丑惡本性。

作品的把屈原一生的艱難而光輝的一生，在劇中集中在一天來表現，使劇情概括，情節緊張，矛盾對立尖銳。劇中還加進了相當數量的抒情詩和民歌，屈原自己表達志向的《橘頌》賦詞，不斷出現，又用一首燃燒着激情的《雷電頌》，把全劇推向了高潮。這一切，達到了使全劇成為一首激昂悲壯的抒情詩的效果，取得巨大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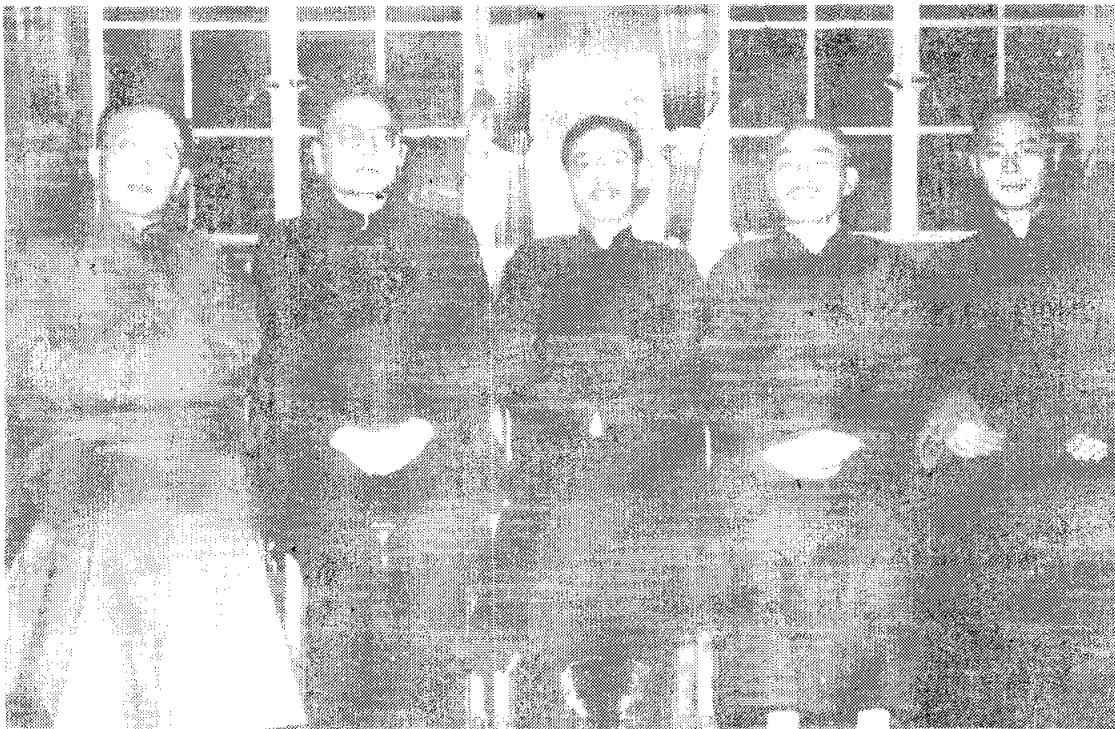
郭沫若這一時期共有六部歷史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完成的《棠棣(dì)之花》是在二十年代的史劇《羣英》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其《虎符》(一九四二年二月)是此時影響僅次于《屈原》的歷史劇。還有三部是《高漸離》(一九四二·六)、《孔雀膽》(一九四二·九)和《南冠草》(一九四三·四)。這六部歷史劇都通過歷史人物和故事，表現了反抗侵略，反對投降時的進代主題。

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早在一九二一年出版詩集《女神》時就出現了，這部詩集里有三個歷史題材的詩劇《湘累》、《棠棣之花》和《孤竹君之二子》。二十年代中期，他又創作了著名的《三個判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羣英》，到了四十年代，他不但在創作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且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系統的浪漫主義史劇觀。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內容。

首先，他提出“失事求似”。“求似”指要求史劇家對自己作品中的歷史必須是權威，有深刻了解，又能真實地反映歷史的精神，“失事”是指在“求似”的基礎上，和歷史事實可以有“出入”，允許作家想象創造。這個原則為歷史劇如何處理歷史事實與藝術真實和歷史與現實的關係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做到以古諷今，古為今用；郭沫若的史劇都是歷史的悲劇，他也有獨特的悲劇觀。他說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沒有發展到足夠大，而使社會停止的力量也不十分弱，在這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郭沫若 50 歲辰，創作生活
25 周年留影(手中大筆為同事們所贈)



一九四六年冬郭沫若、洪深、矛盾、葉聖等在上海(左起)

個時候就產生悲劇。他通過研究，認為“戰國時代，整個是一個悲劇時代”。關於悲劇的價值，他說不在使人悲，而在于激起人們把悲化為力量，目的是號召鬥爭。他也寫苦難與死亡，但不是目的，而在于表現人物在精神上是不可戰勝的。這與西方悲劇認為悲劇的結局應該引起恐怖和憐惜之情不同；郭沫若強調史劇的結局的詩意美。他的史劇人物，都有豐富的感情和理想主義色彩，他是以浪漫主義詩人身份，進行創作的史劇家，所以，郭沫若很注意主觀感情的抒發，戲劇的衝突設置得大起大落（กลับหน้ามือเป็นหลังมือ），緊張激烈，在高潮處長篇抒情獨白，并在劇中插入（แทรก）吟詩，歌舞等場面，人物的語言也是充滿抒情的詩的語言，使他的作品達到了詩與劇的統一。

郭沫若是一位淵博的著名學家。又是一位有才華的文學家，他自身的優越條件、使他的史劇作品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對歷史劇理論的系統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他也是第一人。

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

夏衍在抗戰期間，奔波（วิ่งเดินไปมา）在上海，香港、廣州、桂林、長沙、重慶等地，參加抗戰文藝的領導工作，同時，寫下了大量的戲劇作品。在夏衍抗戰劇作中，最能代表他的成就是《一年間》、《一九三八》、《心防》（一九四〇）、《法西斯細菌》（一九四二）、《芒草天涯》（一九四五）、其中，《法西斯細菌》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作品。

《法西斯細菌》、借醫學家俞實夫所走的道路，宣傳了反對為科學技術，不過問問題政治，脫離政治的觀點。俞實夫善良正直，不在乎（ไม่ให้ความสนใจ）個人生活的貧苦，一心一意地研究細菌（jün, เชื้อโรค）學。他相信科學研究的成果是為全人類服務的，相信科學與政治無關，所以，他關門研究，不問政治。但他不問政治，政治卻來問他。一九三一年九月，他獲得日本醫科大學

博士學位，是政治形勢迫使他離開日本，回到上海。他在日本人辦的研究所里研究細菌，“八一三”后，他家的女傭因為出于民族感情，離開不干了，他的女兒也被同學們嘲笑為“小東洋”。為了研究工作，余實夫帶着全家來到香港，但是政治還是追着他，很快，香港也被日軍占領。他親眼看到，自己省吃儉用買來的研究儀器，被日軍搶走，愛國青年錢裕被日軍槍殺，連他自己和妻子，也受到日本兵的凌辱（ຂໍມ່າງຮັງແກ້）。他還看到了更可怕的事實，一批象他這樣“純科學家”研究出來的成果，被用來制造細菌彈殺害人民，科學家成了日本法西斯的工具。現實終于使他明白；“法西斯細菌不消滅，要把中國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可能”。他停止了心愛的研究工作，到貴陽的紅十字醫院去“徒步撲滅法西斯細菌的實際工作”。余實夫的經歷，是不少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經歷。通過他的經歷、作品也使人看，到法西斯主義破壞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質，批評了科學至上思想。

在俞實夫身邊，還有兩個知識分子形象。趙安壽是學政治經濟的，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特別關心，他痛恨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主張改良中國政治、并多次批評俞實夫的不問政治傾向。然而，他自己在政治上奮斗一番之后，不成功，就干脆放棄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做起投機買賣。當法西斯戰爭使他失去一切財產后，他才清楚自己以前的路不對，決心“從頭做起，做一點切實有用的事情”。秦正誼是一個追求實際利益的自私的形象，是知識分子中惡的一類。這兩個人物形象使俞實夫的形象提高，他顯得實干，正直和清白。這三個人代表了三種不同的知識分子的道路，使人受到啟發。

《法西斯細菌》從“九一八”一直寫到一九四二年春的抗戰關鍵一年，寫出了十年的社會風雲，場景從東京到上海，香港、桂林、貴陽、反映了廣闊的生活書面。但主題緊緊圍繞余實夫“科學求國”理想的毀滅，走上抗日求國的正確道路，雖然劇情復雜，結構宏大，但並不使觀眾感到太拖長、太松散，俞實夫十年時間里，住了四個地方，他的每一次移動，不僅是戲劇舞臺場景的變換，更是人物性格思想發展的一個臺階，藝術上取得很大成功。

三、諷刺劇的繁榮

抗戰后期諷刺文學特別興盛，社會原因前面已經說過。諷刺詩我們介紹袁水拍和臧克家的作品，錢鐘書的《圍城》算是諷刺小說，下面先講這一時期更為興盛的諷刺喜劇。

一、陳白塵和他的《升官圖》

一. 作者簡介。

陳白塵（一九〇八—）江蘇淮（huái）陽人。一九二五年開始文學創作，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另一世界》。一九二八年考入上海科專科學校，參加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后退出國民黨，入上海藝術大學，不久又進南國藝術學院，有機會參加田漢編導的一些演出。一九二九年春，他離開“南國”，和朋友一起組戲劇社，但一直與當局衝突，常常失學失業，到處流浪，并曾到過日本。這期間他發表了很多戲劇作品和多部長篇小說及中短篇小說，一九三二年，陳白塵因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被捕，在獄中仍堅持創作。一九三五年出獄后，到上海專門從事寫作，又寫了相當數量的戲劇和小說。有一些作品反映監獄生活，歷史劇《石達開的末路》和《金田村》，是服務于抗戰的好作品。

抗戰爆發后，他組織劇團到四川演出。發表了多幕劇《蘆溝橋之戰》和街頭劇《掃射》。抗戰期間，他先后寫了十幾部劇本和不少散文，后期以諷刺劇著名，抗戰勝利后，陳白塵曾到大學任教，并活躍于電影界。解放后，他仍不停地勤奮地創作電影和戲劇作品。自選的《陳白塵劇

作選》一九八〇年出版。

陳白塵是中國現代文學著名的劇作家、戲劇活動家和小說家、曾擔任過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等文學藝術方面的領導職務，并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

二. 謷刺喜劇《升官圖》

陳白塵的三幕政治諷刺喜劇《升官圖》，完成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九四六年首次上演。為了避開政府的審查，作者把故事發生的時間，安排在軍閥時代的“民國初年”。兩個強盜(โจร์ ผู้ร้าย)為逃避官府的追捕，躲進了一所古老的房子，做了一場升官發財的美夢，在夢中，兩個強盜在一個縣城里，知道在一次農民暴動中，原來的知縣，受傷，秘書長被打死，他們倆就借這個機會，分別冒充(ปลอมตัว)知縣和秘書長。他們和原來知縣太太，各局的局長們，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利益，無視法律，剝削人民，大膽貪污(รับสินบน)，往自己的腰包里撈(lāo)錢。更可恨的是，當老百姓得了傳染病(โรคติดต่อ)，這伙人命高興得不得了，竟然“囤積棺材”，等著人死得越多，他們可以越發大財。上邊派來了檢查的省長。滿口“廉潔政治”，實際是“金錢女人”，這家伙更是撈錢永不滿足，而且辦法也更高。他那特殊的“頭痛病”，必須要用金條來薰(sún, ตามควัน)，結果，這位省長把大量的金條、地毯、珠寶、汽車、洋房、都搞到自己手里。檢查的成果是，原來知縣太太，成了省長夫人，無恥的官吏們，一一得到提升(เลื่อนตำแหน่ง)，最後，正當省長與假知縣聯合舉行婚禮時，憤怒的群眾沖進來，怒喊“我們，要審判你們，走！”，把他們全部抓走，這兩個強盜，也從美夢中被驚醒。

作品通過這伙人的種種表演，揭露了國民黨政權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官就是匪，匪就是官，官匪一家。《升官圖》在藝術上吸收了俄國作家果戈里《欽差大臣》和中國傳統戲劇中丑角(juē)的藝術經驗。夢境的設計，即可以避開政府的控制，又可以充分地采用夸张的手法。劇情也很緊張吸引人，事件看着好像可笑，細一想，又很合理。在笑聲中達到了揭露反面人物的目的。《升官圖》標志着陳白塵喜劇藝術的新高峰，也推進了中國諷刺了國民黨政府機構的工作作風，標志着陳百鹿諷刺藝術的發展。受到了很高的評價。到一九四六年被禁止，在國統區演出了二百多場，成為幾年來戲劇賣座最好的一個劇本。一九四六年後，又搬到了解放區去上演，受到了同樣的歡迎。

二. 陳白塵的抗戰期間其他喜劇簡介

《魔窟》寫的是某個敵人占領的縣城，一伙投降日軍的漢奸，通過他們賣國干壞事的丑惡嘴臉，有力地諷刺了賣國投降勢力，這部作品完成于一九三八年，是抗戰期間最早的諷刺喜劇。《亂世男女》(一九三九)寫一群從南京逃亡到后方城市里的男女，他們離開了抗日救亡斗争，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還自稱是“抗日中”，其實全都是一堆在抗戰中才暴露出來的社會垃圾(lājī, ขยะ)。《禁止小便》(一九四一)諷刺藝術的成熟，是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的一部優秀獨幕劇。《結婚進行曲》(一九四二)是在獨幕劇《未婚夫妻》(一九四〇)基礎上，再擴充寫成的五幕劇，通過一對夫妻在租房、找工作、婚姻自由的矛盾中，遇到的種種使人哭笑不得的怪事，暴露了人民沒有基本生活權力的黑暗現實，也贊揚了青年人爭取自由和幸福的鬥爭精神。《秋收》(一九四〇)年是一部生活喜劇。總之，抗戰期間，陳白塵的喜劇和正劇、史劇與現實結合，敢于批判，人民性大大增強，使他進入戲劇創作的黃金時代。

二、其他劇作家的諷刺喜劇。

一. 吳祖光一九四六年的《捉鬼傳》是在古代神話中取材的諷刺劇。鐘馗(kuí)是中國很有名的神話人物，他的捉鬼的本事最大。作品《捉鬼傳》中，鐘馗把人世間的各種鬼怪都捉完

了，他高興的大喝一頓，醉了一千多年。可是他今天醒來后，卻發現這個社會上又“遍地是鬼”，更加危害人民，而且道法也都高強，和一千多年以前的鬼不能比，都本事勝過自己千萬倍。與這些新“鬼”們，鐘馗大敗逃走，只好躲到深山中隱居起來。作品大膽地讓古代和現實，人間和“陰間”在舞臺上交換出現，形成強烈的對比，暴露了社會上的各種黑暗，取得了和《升官圖》一樣的效果。

二. 宋之的一九四八年的著名喜劇《群猴》是在解放區創作的，諷刺直接針對的是國民黨政權。在國民黨政府的“國大選舉”時，在某鎮上，參加選舉的代表都到孫鎮長家里來行賄（ໃຫ້ນັນ），這些人都有背景，屬於各個派系。他們都請孫鎮長幫忙，為了各自的利益，又吵又打，丑態百出，警察來了，他們都趕緊裝成是要(shuā)猴戲的。作品諷刺了這些人物，實際是一群穿着衣服的猴。

三. 龐白音一九四八年創作的獨幕劇《南下列車》，背景是一九四八年，解放軍隊伍就要打到長江，蔣介石被迫“辭職”，國民黨政府南逃廣州。在一列從武昌開往廣州南行列車的餐車上，一群國民黨的重要人物，正在向南逃。作品諷刺了他們混亂慌張(ກະພຶກສິກລາມ)的丑態，反映出了國民黨集團滅亡前個人只顧逃命的情景。

第五節

“七月”詩派與“九業”詩人和政治諷刺詩

一、“七月”詩派

“七月”詩派是在抗日戰爭中興起的一個詩歌流派，它存在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歷史時期，是新文學上時間最長的詩歌流派。這個詩派的名字是來自胡風主編的刊物《七月》。這份刊物雖然在“皖南事變”後被迫停刊，但在以後，一直到新中國成立，這些詩人仍聚集起來，保持了最初的風格和創作思想，在其他刊物上不斷地發表詩作，仍然是一個整體。

胡風(一九〇二——一九八五)現代文藝理論批評家、詩人和翻譯家，湖北春縣，出生在小商販家庭，八歲開始上村學。一九二五年入北京大學，一年後轉入清華大學英文系。一九二九年秋，去日本留學，考進東京慶應大學英文系。一九三三年春，他因為在留日學生中組織抗日文化專體，被逮捕入獄，同年七月回到上海。

回國後，他除了創作和翻譯外，成為“左翼”文學運動的重要理論家，引起“兩個口號”的論爭。他還對新作家如蕭紅、艾蕪、田間、艾青等人熱情介紹，及時推薦。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他在上海編輯出版的《七月》，注意發現和幫助文學新人，形成“七月”詩派。《七月》停刊後，他又編輯文學雜志《希望》，在文藝界引起關於“主觀”問題的爭論。這場爭論一直持續到解放後。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風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被稱作“三十萬言書”)，他被捕入獄，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又出獄重返文學界。

對胡風的文藝思想，中國文藝界今天仍有爭論。胡風是一位極勤奮、活躍的理論批評家，他理論活動的範圍相當廣泛。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收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之卷本《胡風評論集》中。

胡風是“七月”詩派的重要詩人，以寫政治抒情詩而著名，他早期詩收在《野花與箭》中，抗戰期間的詩收在《為祖國而歌》等詩集中。在詩歌理論方面，胡風認為，詩人應跳出被長期限制在里面的個人小圈子，不能對抗日鬥爭採用旁觀的態度。他要求詩人首先要“做人”，成為“為人類自由幸福的戰鬥者”，以保證他們的作品，能唱出人民的心聲和時代的精神、在談到大眾之

情和個人之情的關係時，他認為，表現大眾的革命情感是對的，但這大眾之情應體現“詩人的主觀精神活動力，”如果它們不在詩人‘個人的’情緒里取得生命”，就不可能是真正的詩。關於政治抒情詩，胡風也有很深刻的見解。

“七月”詩派，以一九四一年九月《七月》停刊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主要的詩人有綠原、魯藜、亦門（阿壠）、冀訪、曾卓、天藍、鄒（zōu）荻（dí）帆、彭燕郊等。其中能代表這一詩派藝術風格，成就較高的有四位詩人：阿壠、綠原、魯藜和天藍。

阿壠（一九〇七——一九六七）是“七月”詩派後期的重要詩人。他長期生活在國統區。《織夫》是他的代表作。詩中那條“古老而又破漏”的大木船，是近代中國的象征；用它在逆（nì）水（ทวนหน้า）頂風中行駛，來比喻中華民族前進的艱難；而那些頑強地拉着繩繩的織夫（กู่รี）們，就是中國人民的形象，“一條繩組織了腳步，組織了力”，從這裡詩人看到中華民族集體的力量和團結的重要性，詩歌唱出了民族復興的希望。他的另一篇詩作《霧》，揭露了霧里“不明白的世界”。

魯藜是一個帶着“陽光”與“綠草”加入“七月”詩派的青年詩人，他的詩里充滿了濃濃的泥土氣息。他歌唱“泥土”、“草”、“星”、“山河”、“野花”、“雪花”、“雲”、“水”，反映了解放區青年對美好的大自然的愛。小詩體現了魯藜詩的抒情個性和藝術風格。《泥土》是一首只有四行，卻受到廣泛的傳誦（sòng，ซ懵เชย）。

老是把自己當作珍珠/就時時怕被埋沒的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眾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

“七月”詩派的詩大多有很強的抒情性，但這情不是“小我”的個人感傷，他們詩中“我”的情緒，是與大多數人的心相通的。這正是胡風所主張的“抒情”。他們的詩緊緊地與現實相連，伴着人們度過民族的苦難，像子彈射向反動統治，又像鮮花慶祝新中國的誕生。另外，他們還用抒情評論國際政治，是詩的時事評論，這是四十年代詩歌的新因素。

“七月”詩派對自由體詩在四十年代重新興起，有很重要作用。他們在詩的形式方面，認為“詩情”更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講，詩在文字之外，詩在生活之中”。因此，他們的詩就是寫得十分自由，如阿壠的一首《未曰》，最短的詩行只有一個字，最長的達到了三十五個字。

二、“九葉”詩人

抗戰後期，杭約赫（曹辛之，一九一七——）主持創辦了《詩創造》月刊和《中國詩歌》月刊。這是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重要的進步詩刊，當時許多進步詩人在這兩個刊物上發表作品，其中杭約赫、辛笛、穆旦、陳敬容、鄭敏、唐祈、唐堤（di）、杜運燮、袁可嘉九位年輕人，他們有的學習研究外國文學，有的人從事翻譯工作，都接受過西方象徵派、現代派詩的影響，他們運用這些流派的技巧、手法寫詩，風格都很接近，形成了一個流派。但“九葉”詩人，并不是當時的叫法，在以後的三十多年里，這些人漸漸被人們忘記了，直到一九八一年，他們出版了詩選《九葉集》，才被人們這樣稱呼，也被叫做“新現代派”。

穆旦（一九一八——一九七七）是最能代表“九葉”詩風格的詩人。他的詩也標志着中國現代派詩歌的一個轉變，那就是從只表現自我，變到把時代的風雲和人民的命運，同自我感情融在一起。他四十年代寫的《黃土》一詩，用“一個農夫”；象征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寫“多少朝代在他的身旁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壓在他身上”，在他身上“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詩描寫了他的苦難經歷后，又寫到，在抗日戰爆發時，這位堅強地活下來的農夫，終于醒來，投入了戰爭，詩人在他的身上，看到“一個民族已起來”。把自己對民族和人民的愛，表現

在對農夫的描繪，又在對農夫的描繪中，表現出自己心里想的。這個農夫是詩中創造的一個“意象”，這種創造意象的辦法，正是現代派詩人常用的一個主要手法。

在詩的藝術風格上，“九葉”詩人正是反對把詩只看作是感情流露的傳統觀念，而強調思考的作用。他們還提出“新詩戲劇化”的主張，目的是避免直接的表達，而要選用一個事物，寄托作者的情思，所以，最注意詩中意象的創造。

在內容上，“九葉”詩人正視現實，表現真實感情，他們描寫四十年代人民的苦難、鬥爭和對光明、自由的渴望。他們的詩反映了動亂的現實，歌唱對祖國的愛，具有現實主義精神。他們詩歌內容廣泛，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方法都使用，把個人感情和大眾感情融合一處。所以，應該說他們已不是純粹(cui)的現代派了。但“九葉”詩人內部，還是有一個總體風格，而且也比較穩定，當然每位詩人又有自己的個性，而且也有相當數量的詩，表達個人感情的，但這感情已不是再那樣傷感、如陳敬容的《從灰塵中望出去》、《珠和覓(mi)珠人》、鄭敏的《寂寞》；現代派最喜歡寫的生與死，他們也寫，但理解不同，如鄭敏的《時代與死》。

“九葉”詩人有大量優秀詩作，很多一直流傳到今天，這里只能例舉幾個。辛微笛的《布告》、陳敬榮的《力的前奏》、杭約赫的《六行一贈梅》、杜運燮的《追物價的人》、鄭敏的《金黃的稻束》。

這個詩派存在了兩年，時間極短，卻因為風格獨特，為新詩增添了光輝的一頁。他們九人中，雖然沒有一個人能像李金發、戴望舒那樣有名，但在吸收、運用西方象派、現代派藝術，使它中國化方面，卻因為有了二、三十年代的基礎，少走很多變路，這使他們合在一起，共同創造的成就，已超過了三十年代的現代派，更不用說李金發了。

三、政治諷刺詩

四十年代國統區詩歌中，諷刺詩非常繁榮，許多詩人都寫過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諷刺詩。這背后的原因，就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各種矛盾大暴露，統治者也都隱藏不住可笑的真面目。那時，國統區已有很多諷刺民謠(เพลงป้าน)存在。如重慶一首諷刺國民黨官員的民謠說：“遲遲上班簽簽到，擺擺龍門說說笑，理理抽屜磨磨墨，寫寫私函看看報；……”

在政治諷刺詩中，成就最高的詩人是袁水拍和臧克家。

一、袁水拍(一九〇七——一九八三) 江蘇吳縣人，出過《人民》、《向日葵》、《冬天凍天》等詩集，大多是政治抒情詩。四十年代抗戰勝利後，開始以馬凡陀的筆名，在報刊上發表政治諷刺詩，後來收在《馬凡陀山歌》和《馬凡陀山歌續集》兩本詩集里。

袁水拍諷刺詩的內容非常廣泛，四十年代國內重大的政治和經濟事件他差不多都寫到了。他特善于寫廣大城市居民關心的社會問題，把他們的願望和煩惱(วิตกกังวล)寫出來。並在藝術上給典型化。他最有名的就是《發票貼在印花上》。這首詩用夸張的筆法，把國統區的各種黑暗現象，都匯集到了這一首詩里。國民黨統治後期，物價高漲，錢貶(biǎn)值(เงินเพ้อ)到了可笑的程度，這個問題連着千家萬戶的心，袁水拍這個題材的詩很多，如《抓住這匹野馬》、《活不起》、《如今什麼都值錢》等，都是諷刺使老百姓受害最深的國民黨財政政策。在《一只貓》里，詩人寫的是反動派對人民和洋人的兩種面目：軍閥時代：水龍(刀)/還政于民：槍連炮。/鎮壓學生毒辣狠，/看見洋人一雙貓：/妙嗚妙嗚，要、要、要。

袁水拍的其他好的諷刺詩如：諷刺欺騙人民的《改革歌》，國大代表選舉的《毛巾選舉》、《國大代》，特務統治的《警察巡查到府上》，國民黨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的《活的對死的說》、要求美軍離開中國的《上海之戰》等。

袁水拍的諷刺詩，較好地借鑒了民間歌謡的表現手法，創造出了一種新自由體詩和民間傳統歌謡相結合的通俗化新詩形式。很注意容易記誦和便于傳播流行。

二、臧克家的政治諷刺詩。

臧克家四十年代出版過《寶貝兒》、《生命的零度》、《冬天》三部諷刺詩集。他的諷刺詩和袁水拍完全不同，他不是用人民大眾的口來編“山歌”，而是詩人自己感情的表達，他的諷刺帶有明顯的目的性；另外的一個特點是他的諷刺帶有政治評論性，反映的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主題都比較嚴肅。如《槍筒子還在發燒》，就是關於抗戰勝利後，又爆發內戰的。《勝利風》這首詩，最能體現諷刺風格。

政治犯在監獄里，/自由在枷鎖里，/難民在街頭上，/飄飄搖搖的大減價旗子，/飄飄搖搖的工商業，/這一些，這一些點綴(zhui)着勝利。

除袁水拍和臧克家外，在國統區寫諷刺詩比較有影響的還有鄒荻(dí)帆(fān)、黃夢寧等人。鄒荻帆的政治諷刺詩是《惡夢備忘錄》，黃夢寧的是《民主短簡》。

第六節

中國現代文學的結束和總結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大地上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又進行了三年的內戰，即三年解放戰爭，國民黨政府慘戰三年，大江東去。到一九四九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解放了中國的大部，北平、天津兩大城市也已先后解放，國民黨的統治馬上就要結束了。在這種情況下，全國的進步作家和對國民黨統治不滿的中間派作家，從全國各地來到北平，接受郭沫若的建設，經過三個月的準備，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召開了（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會，簡稱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大會共邀請代表八百二十四人，但由于當時的環境、實際到會代表是六百五十人，包括了全中國文學藝術界的各方面代表。這是中國新文學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代表大會，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的第一次大會合。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郭沫若、茅盾、周揚、毛澤東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主席臺上

毛澤東親自出席大會，向代表們

表示歡迎，朱德、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郭沫若作了總報告，題目是《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茅盾、周揚分別對國統區和解放區的文學藝術情況做了報告。這幾個報告是三十年來中國新文學發展的一次大總結。這說明，第一次“文代會”回顧歷史，檢閱成績，總結經驗，確定了今后的文藝發展方向。大會于七月十九日閉幕，產生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即“全國文聯”，選舉郭沫若為主席，茅盾、周揚為副主席；同時，成立了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曲藝協會。

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宣告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發展告一段落，也標志着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也叫“新民主主義文學”）新時期的開始，從這以後的中國文學叫當代文學。

在中國三千年的文學發展史上，三十年是很短很短的一段時間，但卻在中國文學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三十年，從開始到結束，正好連接着兩個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時代，“一九一九”和“一九四九”，這個事實說明，中國文學的發展，離不開革命的發展，文學的命運和社會政治的命運，是緊緊連在一起的。

二、中國現代文學的總結

一般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分為三個時期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是第一個時期。也就是“五四”運動和國共兩黨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這是新文學的誕生期。在這一時期，在二十世紀國際進步文學的影響下，新文學同舊文學進行了一番激烈的鬥爭，剛剛從舊文學中脫離出來，新文學的特點，如果用一個比喻，是一方面充滿着少年時代的勇敢和無所畏懼，另一方面也帶着母體舊的影響。剛開始時，還像小孩學走步階段，在向外國文學學習過程中，處在模仿階段，但它也在批判舊文學、舊世界中，快速地成長，有孩子氣，也有朝氣。茅盾認為，這一時期十年，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是前期，這一階段新文學好像很平靜，作者不多，刊物也很少；後五六年，就不大相同了。從一九二二年開始，出現了一個全國範圍的文學運動。大部分作者是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文學團體和刊物，大量產生，又很快消失，但對新文學的推動意義很大。接下來就產生了大批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們使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期熱鬧起來。歷史上的運動，包括文學運動，大部分都是由青年人發動或當先鋒，這在世界各國都是一種常見現象，中國的“五四”運動也是這樣。在這第一個新文學十年里，就誕生了魯迅、周作人、胡適、鬱達夫、郭沫若、茅盾、葉聖陶、冰心、聞一多、徐志摩、朱自清等一批世界聞名的作家、學者和詩人。他們幾乎全部都留過學，接受世界新思想，為新文學的誕生和發展，做了重要的開辟工作。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為第二個時期，也就是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這是新文學的發展期。和第一時期相比，主要的成就是：在理論上，有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主張，以及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在創作上，文學反映的社會生活更加廣闊，出現了以前沒有過的主題。特別是長篇文學有了大的發展。如《子夜》、《家》、《駱駝祥子》、《雷雨》等一大批杰作，在文學組織方面，通過二十年代後期進步作家內部的爭論，思想上取得了一致的理論，在這個基礎上，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了以魯迅為主的進步作家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思想上，由於政治的關係，文學思想的鬥爭極其激烈複雜。總的來看，“左聯”時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個連接點。它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但也有一些問題，深深地影響到以後文學的發展，甚至到今天也常常引起爭論。這一時期，除了原有的一批作家外，比較活躍的又有了巴金、老舍、丁玲、沈從文、曹禺、田漢、夏衍、艾青、林語堂、梁實秋等名家。這一時的文學主要特色是，作品的民族化和大眾化問題，受到了普遍的關注。

從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是第三個時期，也就是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這是新文學的成熟期，主要標志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講話》總結了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中，出現的經驗和問題，指出了整個文學藝術新的發展方向。並且，在已經建立新政權的地區，第一次創造了作家和工農兵相結合的條件。有了這個基礎，文學作品才朝着大眾化和民族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使西方影

響大大減少。在這個時期的開始烏適應抗戰的新形勢，“左聯”自動解散。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漢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這個時期的作家隊伍，在國統區、上海“孤島”和香港等地，除郭沫若、巴金、老舍等原來的一批老作家，繼續寫出新作品外，沙汀、艾蕪、張天翼、吳祖絅、田雨、何其芳、錢鐘書、艾青、臧克家等人，也都成了這一時期很有名的作家。在根據地解放區，還有另一批作家，他們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通過創作實踐，成熟起來，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們主要是趙樹理、孫梨、李季等等。

中國現代文學經過了三十多年的艱苦前進，在每個時期都有光輝的成就。它不僅產生了一批真實地反映時代，有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而且產生了以魯迅為代表的偉大作家，他們都是有世界影響的。他們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文學領域里，建立了一個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并且和世界其他民族有密切關係的中國現代文學。

思 考 題

一. 回答問題

1. 茅盾的小說《腐蝕》，反映了怎樣的抗戰形勢？
2.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怎樣分析中國文化與抗日戰爭的關係？
3. 在《財主的兒女們》這篇長篇小說中，作者路翎描寫蔣純祖的生活道路，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甚麼特點？
4. 請舉例解釋，錢鍾書在《圍城》中，怎樣諷刺了抗戰後方的知識分子？
5. 把巴金的《寒夜》中，三個主要人物的關係和性格怎樣？
6. 四十年諷刺文學興起的原因是甚麼？有哪幾位主要作家？

二. 名詞解釋

1. 初家文化；2. 《紅樓夢》；3. 張恨水；4. “九”詩人；5. “七月”詩派；6. 《馬凡陀山歌》

作 品 選 讀

- | | |
|--------|------------|
| 1. 老舍 | 《四世同堂》(節選) |
| 2. 錢鍾書 | 《圍城》(節選) |
| 3. 郭沫若 | 《屈原》(節選) |
| 4. 阿壠 | 《鐵夫》 |
| 5. 穆旦 | 《贊美》 |
| 6. 袁水拍 | 《發票貼在印花上》 |
| 7. 臧克家 | 《勝利風》 |